

读书

D

U

S

H

U

2009

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书

2009

1

January

D U S H U



凌 斌 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

何 刚 忧患与批判

徐 贲 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

刘再复 五千里恒河的游思

陈平原 假如没有“文学史”

张承志 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

王振忠 搜读人间未见书

写短些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文章越写越长，值得研究。

书写工具的改进当然是原因之一。用刀子在竹木简上刻字很累人，自然越简越好。用笔写在绢帛或纸张上方便得多，文章也就长起来了。到了电脑普及的时代，能有一天数千字乃至数万字的写作速度，并非真有倚马之才，不过书写手段更为便捷罢了。

但文章越写越长还有其他原因。一日复制。复制别人，也复制自己。复制别人叫抄袭，复制自己叫重复。一抄一复，洋洋万言不难。大段复

制，在电脑里不过举手之劳。二是串话。说到主题前先穿靴戴帽，抄一个程式下来，须几十字或上百字之多。其实，并不是每一处都有必要把根脚从头数的，但这类话一旦成了串儿，就没有人敢少说一个，如同县里一个部门做工作总结时，一定要历数从中央到省委到市委到县委的“英明领导”、“高瞻远瞩”、“亲切关怀”、“具体指导”一样。

这类文风，事关党风、政风。要改变须上面带头，才能叫上上下下稍稍有点震动。

凌 斌	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	3
丁元竹	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应对经济危机	11
何 刚	忧患与批判	19
徐 贲	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 ..	28
子安宣邦	从冲绳看起	37
何 恬	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	45
刘再复	五千里恒河的游思	55

短长书

走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喻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是黑格尔的命题(陈启伟)·“小产权”与“农民工”(冯世则)

陈平原	假如没有“文学史”	69
旷新年	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76
张承志	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 尚能学否	86
董 强	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	94

黄灿然	在兼容中锐化差异	105
王振忠	搜读人间未见书(上) 日出而作	112
迟子建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121
杨 晶	杨刚之死	132
张伟然	邻家秋深	141
吴志攀	斯人已逝, 遂成绝响	148
何吉贤	“手绘的图纸”与许诺的“黄金世界”	156

读书平台

让考古报告走出象牙塔 (梁太鹤) · 我曾经历的“诗意”(吴静男)

赵汀阳 漫画

陈四益 黄永厚 画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十年。从“真理标准”到“市场经济”，从“民主法制”到“人权宪政”，从“民族国家”到“儒家传统”，从“经史子集”到“古今中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牢牢引领了这三十年来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议题。可以说，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塑造了我们整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

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影响日益增长，我们需要追问，又是谁在塑造中国学界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构成我们阅读和研究语境的是哪些作品？是政治文献，还是学术文献？是古代经典还是当代前沿？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作品，还是源自译介西学和重刊旧作？这些作品和作者主要源自哪些领域和学科，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文史哲还是政经法？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形成了怎样的知识结构，又经过了如何演进？不论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这些都是我们回顾和反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历程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十年前，以《走向封闭的美国心智》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布鲁姆在检讨美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将“美国心智”和盘托出，进而反思批判。如今，我们本着同样的精神追问，三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心智”，塑造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如果我们关切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学术的原因，并非只是要纪念一段已经逝去的黄金岁月，而是为了自省过去和面向将来，那就必然要托出这个“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记录了五百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在最近十年间引证的两百余万篇文献。这些文献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了形成整个学界研究语境和心智结构的主流作品。抚今追昔,选取其中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七年三十年间发表、重刊和译介的主要文献,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十年管窥三十年”的可能门径。

总的来说,不论以单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为时间单位,学术文献始终在当代学界影响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随着发表时间的临近而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大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如果以平均每年被引十次以上作为“影响学界”的最低标准,那么三十年间影响中国学界的各类文献共计七百八十五篇,其中学术文献七百二十篇,约占被引文献篇数的92%。

有关中国学界心智结构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古今中西之争”(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从被引文献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尚未出现显著的“古今之争”,有的只是“中西之别”。若以作品最初发表的国别而论,中国学界对外国文献的引证在数量和比例上始终高于本国文献。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中国文献三百四十六篇,约占被引文献篇数的48%;国外文献三百七十四篇,约占被引篇数的52%。并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从趋势来看,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在近年发表的学术作品中,本国文献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间,已经与外国文献大体持平。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单位,三个十年间影响中国学界的本国文献分别为五十七篇、五十四篇和二百二十四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38%、27%和49%。

相比之下,无论是中国古代文献还是西方古代文献,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影响都颇为有限。其中西方古代文献最少,实际上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作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重印的中国古代典籍和再版的改革开放前的发表文献也寥寥无几(整个三十年间只有二十七篇,不到被引文献总数的4%)。学界引用最多的

是国外资本主义发展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并且绝对数量始终占全部古今中西被引文献的一半以上(三百七十一篇,约占学术文献的51%)。其次是中国当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发表的作品(三百一十九篇,约占学术文献的44%)。虽然仍不到一半,但是随着发表年代的临近,被引文献的数量和比例大体呈上升趋势。这多少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确在日益变得“中国”,尽管我们还并不知道,这究竟是由于最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学术因而越来越少需要加以援引,还是我们的确开始日益形成了本国的学术脉络。

另一个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是“人文社科之争”。仅从学术影响(而不是学术水准)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人文学科日渐衰落萎缩的三十年。不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看都是如此: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一百七十三篇,平均每年不到六篇,在整个中国学界所占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特别是最近十年发表的作品已然不及六分之一。其中原创的人文作品只有三十九篇,平均每年一篇多,不到同期社科作品的六分之一。如果逐年细看三十年间发表并在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这些作品,会看到两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点。一个是一九八七年。之前的十年间发表的学术作品,人文学科占主导地位;此后二十年,社会科学则一变而为主流,至今不渝。一个是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之后发表的人文作品在当代学界尚无一篇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科学独霸天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给社会科学带来的是机遇,而给人文学科带来的更多是挑战,甚至是严酷的挑战。

当然,引证数量降低只能说明学术“影响”下降,并不当然意味着学术“水平”下滑。而且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可能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人文学科久而弥笃,社会科学追新求变。此外,人文学科更多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以于一部人文学科作品越是成功,就越是不会被人们引证。或者,人文学科在最近一些年没有产生影响广泛的学术作品,可能恰恰意味着这一领域的格外繁荣: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结

果是沒有一枝獨秀和一馬當先。還要注意到，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各自的CSSCI選刊規模不同。CSSCI選擇的社會科學期刊大約要比人文學科多一倍。這些因素都提醒我們，在做出解釋時必須小心。

不過，即使考慮到上述因素，只是著眼於兩個領域的各自趨勢而非相互比較，依然會看到人文學科自身的影响下降。人文學科原創作品的影响相比於自身日漸衰退。以十年為計，三個十年間稱得上影响學界的人文作品分別為九十篇、四十九篇和七十篇，約占被引文獻總數的60%、25%和15%。如果剔除重印古籍的部分，改革開放三十年本身貢獻的原創人文學術作品所占的比例將會更低，三個十年間分別為二十三篇、七篇和二篇，約占被引文獻總數的15%、4%和0.4%，明顯呈迅速持續下降的趨勢。逐年看來，也大抵如此。在選刊範圍不變、作品發表數量大致穩定的情況下，的確存在人文作品影响隨著發表時間的臨近而急劇下降的情況，而且是从二十年前就開始了。很多學者的呼喚的確並非杞人憂天：中國當代學術正在面臨一場“人文危機”。

但這未必是學術水平的降低所致，而只能是說人文學科作品在中國當代“主流”學界的學術“影响”日漸低落。特別是，人文學科如今越來越多以書代刊、只著書不發文的明顯趨勢也在提醒我們，也許與社會科學日益貼近以期刊為發表媒介的主流學術體制相反，很多人文學者選擇了另辟蹊徑、放逐主流體制的不同學術方式。如果確系如此，那麼與社會科學日益學術大眾化和世俗化的趨勢不同，人文學科呈現了日益精英化和團體化的傾向。對人文學科影响的考察也需要另做更為細緻的研究。

不論如何，以往的人文與社科之爭，到這裡似乎是可以做一個暫時的結論了。結論不在於勝敗輸贏，反而是表明瞭兩者本無所爭。中國當代人文學科作品在主流學界的尷尬地位不在於社會科學的崛起與擠壓，而是在於自身的走勢與選擇。如果說真正有所競爭，也許是在於社會科學吸引了更多的學術資源，包括學者、教師和學生。這是否會進而真的

影响到学术水平？很多人文学者在为此担忧和呼吁。至少我们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了经济管理、法律、政治，接下来是选择新闻、社会、信息、教育，最后才是文史哲。八十年代初的黄金十年，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任何学术体制和学术大师都没法改变这一历史洪流的大势所趋。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学术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强劲的影响，或许也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与布鲁姆对美国学术界的诊断截然相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是中国心智走向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学术全面“对外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西学译介，表现为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而这种成就具体来讲基本是汉译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尤其是汉译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是西方人文学科作品的近四倍）。而且，如果我们把那些计算在“原创文献”名下的作品仔细检审，会发现相当多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介绍西方学术，很多是研究型的教科书，甚至径直以“西方××研究”为题。没有哪个文明大国会像中国学界这样，开放到三十年间对国外作品的重视始终远远超过本国。

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究竟反映的是改革开放真正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全面学习西方，还是我们的确已在文化上脱亚入欧、洗心革面，在“改革”中悄然间皈依了西方学统。但这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一个客观状况。至少，对于“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这就是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定的阅读和

研究语境，是我们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

中国心智开放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作品都在急速上升。而且经过了最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将社会科学完全贴上“西学”标签。所谓“汉学在海外”是一个例证，最近十年社会科学在当代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获得的普遍承认是另一个。

表面上看，本文呈现的中国心智和布鲁姆揭示的美国心智走向相反，但是实际上，开放和封闭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内封闭，对现代的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古典的封闭，对国外作品和作者的推崇多半潜藏着对本国作品和作者的低估，改革之初的人文经典当红和当代的社会科学新作走俏，背景里形影相吊的是当代的人文研究和早年的社科探索。如果我们能够对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准有所判别，那么中西方古典作品在中国心智中的尴尬位置，当代人文作品的微弱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短暂生命，都意味着“古今中西之争”和“人文社科之争”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而且，尽管“心智开放”（open-minded）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语汇中无疑是个褒义词，但这充其量只能表明政治正确，而丝毫不意味着学术正确。一些作品之所以被广泛引证，也许恰恰反映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流弊。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尽人皆知而鲜有例外的状况是，由于资料和信息极度匮乏，学者们的阅读和研究水平往往取决于碰巧邂逅的是哪本著作。对翻译作品尤其如此。书架容量决定心智空间，这是三十年来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而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中国心智之盘，我们能否在未来的新三十年中产生更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从而使中国心智变得更为成熟和明智，显然都是比开放与否更为重要的问题。

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学术发展，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对中国学术

的深刻影响。“改革”逐步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代之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而对政策科学产生了广泛需求,也为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市场。而且对改革本身以及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辩论与反思,也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运用和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这些领域中具体问题和实践效果的兴趣。社会科学的全面兴起就是对这一社会需求、历史使命和世道人心的积极回应。这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而不是理论创新。我们记住的名字是王选、袁隆平和柳传志。“开放”激发了中国学术界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轮引进西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从欧美日到亚非拉的翻译和留学,使得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在材料和方法上,而且在眼界和观念上,重新塑造着中国学人的文风、方法和论证前提。几乎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今的主流学者都有留学和访问西方国家的经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三十年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开放中国的学术心智,尽可能广泛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思想文化,从而解放思想,鼓励创新。这正如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得益于在资金、技术和人力各个方面的“引进外资”。

改革开放进而重塑了中国学界乃至日常实践的论说方式。冯象先生对此讲得透彻:政治的表现方式从前是文学,现在是法学。以前政治家要谈《红楼梦》、《水浒传》和《海瑞罢官》,现在知识分子要讨论法治、宪政和金融改革。以前“老三篇”是宪法,现在的宪法也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按照冯先生的看法,也许三十年来人文学科在主流学界的影响降低未必是精神上的衰落,而社会科学影响的蒸蒸日上也并非智识上的飞跃:一切都只是修辞技巧和表达策略的变化。同时,尽管言说的方式不同,也许每一代人关切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那些人类永恒面对而亘古长存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中国熔铸于经史,在古希腊表现为哲学,在现代社会则是“大隐隐于朝”,化身于成本收益和统计数字之中。这样看来,如今严重分裂的古今中西和人文社科,也许会随

着中国在全球多极一体进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而重归一炉。也许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学界，竟会是中华与泰西齐飞，人文共社科一色。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巨变，也带来了中国学术和学人的兴衰浮沉。一方面，学术的流变与跃迁是残酷的。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正是如此。同时，学术的流变与发展又是漫长的。正如哲人尼采所说，“有的人死后方生”。那些当代被忽略的作品和作者，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未必不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许多在最近十年尚未显赫的人文社科著作，也许将俘获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心智。

而那些在当代学术影响排序中高居榜首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真有学术品质，也还没有盖棺定论。引证只能测度影响，不能说明水平。因为学术造诣的深浅高低与自由民主的分配机制并不相同，中国心智的成熟与否也并不取决于开放程度。用引证“投票”选出这些作品的中国学界自身究竟水平如何，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就值得评价。也许再过三十年，人们会由衷惊叹这一代学人的卓绝努力和天才创造，会感佩和追念他们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学术复兴与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与不朽，会将这三十年的学术成就作为一座“永远的丰碑”，一段“纪念的历史”。也有可能，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在未来三十年看来，恰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尚未成熟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中国学术的任重道远。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古今中西之争》，甘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版；《政法笔记》，冯象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也许正在发生》，苏力著，法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来燕榭少作五种》

黄裳 著

定价：44.80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这场目前还不曾见底的全球经济衰退，给各国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解释为政府监管不严，我不这么认为。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贷款者要把钱贷给那些没有能力偿还的人？还可以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世界第一大国会有那么多人经济状况如此恶劣？

经济问题的社会根源与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现实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人的社会性，因此，在经济运行考量中，不能忘记了人，或仅仅把人视为经济人。在人身上，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相互影响。

两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嘉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的《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从一个全新的，但又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视角来审视美国经济，并对当时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人作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他问道：“我们当代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回答是：“最需要的是新思路，最需要的是那些理解经济学人们公正的声音，最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激情。”他引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激情”：

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故事：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

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使他们不能弯过手臂把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下滑绝不是经济运行一朝一夕的结果，它也是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贫富差距扩大与缩小贯穿美国二十世纪，也伴随美国经济的起伏和动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二〇〇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研究发现，二十世纪二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迪克逊·韦克特评论道：“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利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就是我们后边将要讨论的罗斯福的政策和措施。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曾经担任凯尔纳投资公司总裁的理查德·比特纳在其《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中试图描述错误出在哪里，他把那些借款人描述为“信用状况一塌糊涂，收入微薄，工作时有时无，没有租房史，也没有储蓄维持生活”。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银行把钱贷给这样一些人显然是不可行的，政府监管也是不得力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们要问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的穷人，或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

如克鲁格曼所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富人面对的税收不仅高于二十年代，即便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也不能

算是很低的。在罗斯福第一任期，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升至79%，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伴随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所得税率达到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一九二九年的不到14%上升到一九五五年的45%以上。美国富人是“新政”的最大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则成了最大受益者。克鲁格曼是这样评价“新政”政策的，“‘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战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按当前的物价折算，从二点二万美元提高到四点四万美元，相当于2.7%的增长率。各群体的收入也保持了大致相同的速度，延续了“大压缩”时期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状态。“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生产力，反而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曾因没有有效处理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责难的前美国总统胡佛后来说：“当我们充分理解了二十世纪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有能够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问题出在整个分配体制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加拿大一些省份陷入财政困境，一些省级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源来确保法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一些工业欠发达省份根本就没有能力提供与发达省份相同的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于是，欠发达省份只好求助于联邦政府。为了帮助这些省份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建立了处理各省关系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些小城镇开展听证活动，广泛听取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见，根据人们的意见，该委员会建立在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协调基金，对那些没有能力为本省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省份给予财政援助。这是加拿大最早的均等化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均等化措施越来越正规化、制度化，联邦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建立了财政均等化项目。

一九八二年将其纳入宪法。加拿大既是世界上实施均等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和典型的事实均等化政策的国家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开始建立公共福利制度，以应对由于工业革命进程加深引发的新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穷等。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开始。不过，这个制度在美国启动很晚。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不担心没有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美国地广人稀，也可以得到一份农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美国政府没有感到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压力和必要。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这种信念。由于银行和企业破产，有史以来，美国人感受失去工作的痛苦。当时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胡佛认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保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他主张政府对企业的任何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经济状况便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胡佛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为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提供救济。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胡佛政策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引起大多数美国公众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胡佛为克服大萧条所做的努力是不够的，一九三二年，美国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上台不几天，便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的立法提案。国会几乎批准了罗斯福提出的所有措施。大萧条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其中之一，社会保障却成为延续至今的制度。自从罗斯福时期，其他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都把社会安全网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政府还着手为数十万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些美国人受雇于筑坝、修路、修缮公共建筑，以及为乡村社区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电力系统等庞大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为相当多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风险。约翰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完善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其中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公共住宅（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付得起的住宅），等等。

世界经济百年起伏动荡的历史表明，让所有居民获益是实现有效扩大